

## 十九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与意义

邹 振环

### 内容提要

本論文は、19 世紀中葉から始まった中国の文化人が洋学書を通じて西洋最新の地理学知識を吸収した過程を中国の「地理大発見」と呼ぶ。

このような地理知識の獲得に対する分析により、民族国家という概念の形成、異なる文明圏や知識体系に対する認識、清末の歴史書における「正統」概念の再定義等の角度から、中国の「地理大発見」の影響と意義を思索する。

“地理大发现”一词在一般教科书上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含义，主要是指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一些西欧航海家和探险家在地理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的地理发现，包括新航路、新大陆的发现以及人类首次环球航行的成功。对于世界历史从地域走向全球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地理大发现开拓了世界市场，增加了商品流通的种类，使西方思想界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地理大发现成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

“发现”是人类文化变迁的重要源泉。发现可以是物质世界的新事物，如新大陆；也可以是精神世界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如地理意识。笔者借助“地理大发现”一词，把中国知识人较大规模地通过学习西方地理学译著，了解世界地理知识，接受“世界意识”的过程，称为中国的“地理大发现”。[1]这一过程真正开始在 19 世纪中叶，这一大发现是在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即被动挨打的过程中展开的，一方面是 19 世纪初新来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再度将地理大发现的西方地理学新成果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热心西学知识的士大夫重新开始关注明末以来的地理学汉文西书，如饥似渴地汲取 19 世纪新输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虽然 19 世纪的中国没有产生象欧洲一样的市场革命，但在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类似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本文探讨的是 19 世纪中国人通过新思想的“地理大发现”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及其意义。

### 一、空间知识的拓展与“地理台阶”的重建

到清朝灭亡为止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巨大的思想变革，一次是发生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次是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晚清。我以为这两次思想变革都与地理意识的空间拓

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商业与交通的发展,使各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居住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通过不断的经济交往、人口迁徙、战争掠夺,使自己的地域视界被大大地拓宽了。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姬满自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斯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北行1000余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虽然这还尚未成为战国时代普遍的地域视界,但据《吕氏春秋·有始览》的记载,战国时代的实际地域至少包括了现在的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安徽、陕西、甘肃、河北、辽宁等省,比殷和西周时期扩大了一倍多。[2]他们想象自己居住的天下是一个井字形大地,东南西北的“四极”的空间观念出现在《孟子·万章》、《尚书·禹贡》、《吕氏春秋·为欲》等文献中,“禹别九州”尽管只是一个传说,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水平。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地”与“天”是相对应的,天下是一个整齐有序、有固定的中心和有边缘的向外延伸的井字形的结构。战国时代对大地的普遍认识是四方或八方的“回”字形的结构,而这四或八又与向外推衍的与其象征的神祇、季节、时令、色彩相联系。《管子·幼官图》关于东西南北与中的图式、《山海经》对于地理中、东、西、南、北的想象,都显示了当时学者的地理认识水准。也是后来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秦王朝政府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行政措施,和实行文字统一等文化政策的地理基础。

地理视界的拓展,带来了地理学观念突破性的思考。《庄子·秋水》中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僦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3]与这种世界观念颇为相似的还有齐人邹衍的地理“大九州”说。这一为晚清地理学者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世界地域范围的推论,是把《禹贡》九州意识的直接放大,由“九州”推论出八十一州和大瀛海:“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4]庄子和邹衍的地理学思考是以春秋战国时代地理视野的拓展为基础而展开的。邹衍的推论很可能一是来自当时人们对天象地理的观察,因为从《穆天子传》、《山海经》的传说中可以知道,战国时对西北地理知识已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开拓;一是依据了齐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水平。齐国是位于东海之隅的滨海之国,它的海上交通是发达的。根据考古资料证实,辽宁旅顺郭家村下层文化遗存中,有鼎、规等与大汶口文化一致的器物,说明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海上交通。[5]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徐广《集解》称是“海中败吴”,[6]这条材料足以说明位于山东的齐国拥有比吴国更强大的海上力量。生活在齐地这个造船业相对比较发达地区的邹衍很可能了解到航海归来者的某些信息;曾经“徐登缙城以望宋都”,喜欢实地观察的这位思想家也许正是通过上述这些材料,形成了“大九州”和“方今天下在地东南”的观念。[7]这些在当时对世界地理所进

行的探索性的思考,组合成秦代学术的“地理台阶”。[8]齐人徐福正是在这一“地理台阶”上制定出自己大规模的移民计划,而秦始皇会受这种“入海求仙人”、“入海求神药”的蛊惑,同意徐福两次入海的计划,也是基于秦始皇研读过邹衍之书、熟悉“大九州”之说的缘故。[9]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给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变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在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地理学汉文西书中,给中国人带来了地圆意识、五大洲的空间概念和西方人文地理的新知识,但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谷等少数接触西学较多的学者外,大部分的士大夫仍不相信九州之外还有大地的存在,许多学者认为利玛窦、艾儒略是在有意制造五大洲这种荒谬莫考的虚幻空间,他们仍然蜗居在传统文化制造的“虚幻环境”中。明末清初输入的《职方外纪》、《坤輿图说》虽“已为绝完善之地理学教科书”,但很多学者“瞥为影附中国古书,若东方朔《神异经》之类而作”,以至到了“道咸英法之来,而懵然不识所以对付之策”。[10]

对明末清初引进的西方地理学在学术层面作出全面回应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我把这个全面回应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和接受新的西方地理学知识的过程称之为中国的“地理大发现”。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是当时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航海家为了打开与东方富庶的黄金地区进行贸易的新通道而展开的,而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所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却是因为他们面对了携带着坚船利炮在中国沿海游弋的“蛮夷”而生发的探索异域的热情。1832年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写道:“英吉利恃其船炮,渐横海上,识者每以为忧。”1834年汤彝《英吉利兵船记》有英国“以兵船火器横海上”的记述。[11]只要不是想像鸵鸟一样把头插入沙堆视而不见的学者,就不能不穷究这些“蛮夷”的生存空间。这批“蛮夷”不是传统九州大地里的人物,那么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一种文明?他们互相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19世纪中期这是困扰着中国地理学者心中的必然要解答的一个问题。“筹夷事必知夷情”[12],晚清对西方地理学的全面回应首先正是来自这种对自己民族切身利益的关注,也是19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寻找思想“新大陆”的直接动因。

明末清初的那几本地理学汉文西书再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9世纪初以来的西方传教士的地理学译著更是他们千方百计寻觅的认识资源。姚莹(1785—1852)在《外夷形势当考地图》中写出当时他是如何寻找这些文献的:海岸诸国和陆上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孰为远近?无从知之。幸有西人艾儒略、南怀仁所刻坤輿图,可以得其形势。盖即利玛窦《万国全图》而为之也。惟方音称名,与中国传说诸书各别,某即某地,殊费钩稽。道光二十二年,奉命即诸夷囚问英夷及俄罗斯远近,当以夷酋颠林等所绘海诸图地名形势,录供为说覆奏,倥偬军旅中未能详加考订也。第就其所绘图取《海国闻见录》与南怀仁二图校之,形势实相符合,当欲以此三图参互考订,于其他同名异者,逐一详辨之,旋为北逮不果。友人邵阳魏默深,得林尚书所译西洋四洲志及各家图说,复以历代史传及夷地诸书考证之,编为《海国图志》六十卷,可谓先得我心。”[13]魏源的《海国图志》除征引明末清初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輿图说》、高一志《空际格致》、蒋友仁《地球图说》外,1848年出版的裨理哲编

译《地球图说》被《海国图志》征引了34处；麦嘉缔培端1852年编的《平安通书》被《海国图志》征引了11段，《海国图志》卷100的《地球天文合论五》全由《平安通书》内容构成，卷76还引录麦嘉缔培端论证大地为球体的方法及各大洲概况的《地球推方图说》。同时还参考了裨治文译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猎连载于1833-1838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纪统传》上的《万国地理全集》。《海国图志》几乎全录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后者正是据1834年英国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书编译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澳门葡萄牙学者玛吉士《外国地理备考》一书的引用。在1852年出版的百卷本《海国图志》中，共有91处，卷76全录《外国地理备考叙》和《地球总论》，卷96全录玛吉士的《七政》，置于《地球天文合论》之首；地球天文合论三、四都采录玛吉士的著述。据澳门学者谭志强统计，《海国图志》全书引用《外国地理备考》的资料多达12万字，比引用《四洲志》的字数还要多，为所引用的143种书籍之最。[14]

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人开始了重建中国“地理台阶”的过程，曾经对日本和东亚地区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思想，[15]是建立在对“蛮夷”的空间分布渐渐明晰的新的“地理台阶”的基础之上。其实，我们可以从现有的文献中了解到，这种“以夷制夷”不是一个人的观念，而是一代人的思想。就在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五十卷本的1841年，对“英夷”和“咪夷”有了初步了解的阮元致函伊里布：“素知在粤通市各国，英吉利之外，惟米利坚国最为强大，其国地平多米，英夷仰其接济，不敢触犯，而咪夷在粤向系安静，非若英夷之顽梗。若优待咪夷，免其货税，又将英夷之贸易移给咪夷，则咪夷必感荷天恩，力与英夷相抗。”伊里布对此非常赞同，认为“若假咪夷之力以制英夷，似觉事半功倍。”[16]同年裕谦在奏折中称“探闻海外各国，因英逆滋事，贸易平常，无不同深怨恨，如欧罗巴、咪利坚、佛郎机诸国，其势力亦均与该逆相等，在天朝自不值明降谕旨，令其帮助”，但不妨晓谕各国，“大皇帝君临天下，中外一视同仁，顺者抚之，逆者剿之。”并称如果“英逆胆敢恃强阻搁致碍尔等生计，准尔等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或另用兵船，擣袭其国，亦无不可。”[17]在这场“以夷制夷”的讨论中，主译过《四洲志》的林则徐的观点显得最为内行：英国“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咪利坚及佛兰西尚足与抗衡，然亦忌且惮之”，“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揆，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则内向。”[18]为了彻底弄清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地理与政治，1844年和1845年，梁廷楠先后完成了《合省国说》和《英吉利国记》，前者主要依据裨治文译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后者充分利用了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虽然，“以夷制夷”的策略并未获得成功，但这场讨论却促发了清朝官方和民间学界内外上下对域外“新大陆”的进一步探索。

## 二、十九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展示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新大陆”

发现是人类文化变迁的重要源泉。发现可以是新事物，如新大陆；也可以是新思想，如地

理意识。发现是给文化以新的内容,它可以来自本文化系统的内部,也可以来自外部的另一种文化系统。晚清的中国,可以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发现,这种发现先是对域外的文化各个层面的发现,继而是对本文化内涵的重新发现。在地理学界,也可以说,19世纪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地理大发现”。我们这里把能够找到的19世纪译出的各种西方地理学著作分类列表如下:[19]

#### 4. 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

5. 《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 Catechism) [英]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编译 1819年出版于马六甲
6. 《全地万国记略》(Sketch of the World) [美]米怜(William Milne)编译 1822年出版于马六甲
7. 《万国地理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 [德]郭实猎(K. F. A. Gutzlaff)译述 1838年在新嘉坡出版
8. 《外国地理备考》(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 [葡]玛吉士(Machis)撰 1847年收入《海山仙馆丛书》24-28册
9. 《地球图说》(Illustrated Geography) [美]祎理哲[Richard Quanterman Way]编译 1848年出版
10. 《地理全志》(Universal Geography) [英]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辑译 [上海]墨海书馆 1853-1854年版
11. 《地球说略》(Illustrated Geography) [美]祎理哲译述 宁波华花书房 1856年版
12. 《智环启蒙塾课》(Graduated Reading) [英]理雅各[James Legge]编 1856年出版
13. 《地理略论》(Digese of Geography) [英]俾士(George Piercy)编 1859年出版
14. 《地理志略》 [美]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编译 赵如光笔述 [北京]美华书院 1882年版
15. 《地志须知》 [英]傅兰雅著 [上海]1882年刊本
16. 《地理全志》 [英]慕维廉著 [上海]美华书馆 1883年版
17. 《地理问答》 [美]甘第德著 1886年修订本
18. 《地理略说》 [美]戴集著 [上海]美华书馆 1898年版
19. 《坤輿撮要问答》 孙文楨译 上海土山湾书馆 1898年版

#### (二) 地球与地文学

20. 《万国纲鉴》[美]麦嘉缔培端(Davis Bettune Mccarte)编 1850年刊
21. 《平安通书》(Peace Almanac) [美]麦嘉缔培端编 1850~1853年在宁波出版
22. 《地理新志》[New Treatise on Geography] [英]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 1855

年出版

23. 《绘地法原》(Mathematical Geography by Hughes) [美]金楷理(Carl T. Keryer)口译 王德均笔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5 年版
24. 《测地绘图》 英国富路玛著 [英]傅兰雅口译 徐寿笔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6 年
25. 《地理须知》 [英]傅兰雅著 [上海]1883 年刊本
26. 《地理质学启蒙》 [英]艾约瑟编译 [北京]总税务司署 1886 年版
27. 《地志启蒙》 [英]艾约瑟编译 [北京]总税务司署 1886 年版
28. 《地势略解》 [美]李安德(Leander W. Pilcher)著 1893 年汇文书院排印本
29. 《八星之一总论》 李提摩太译 蔡尔康述稿 广学会 1896 年?
30. 《地理初栲》 [美]孟梯德著 [美]卜舛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编译 [上海]美华书馆 1899 年版

### (三) 文化与政治地理学

31. 《泰西城镇记》 [美]丁甦良撰 [上海]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1 帙, 1891 年著 易堂版
32. 《旧金山记》 [美]丁甦良撰 [上海]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1 帙, 1891 年著 易堂 版

### (四) 区域地志

33. 《咬溜吧总论》(General Discussion of Java) [英]麦都思著 1824 年出版于巴达维 亚
34.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A 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高理文[B. C Bridgman, 又译裨治文]译撰 1838 年新嘉坡坚夏书院刊, 分两册。同 年就重版
35. 《大美联邦志略》 [美]裨治文撰 管嗣复改译 [上海]墨海书馆 1861 年版
36. 《犹太地理择要》 [美]纪好弼著 陈觉民述 1882 年刊本
37. 《琉球地理志》 日本政府编 姚文栋辑译 1883 年出版
38. 《英法俄德四国志略》 沈敦和辑译 1892 年刻本
39. 《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 [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著 铸铁生述 广学会 1897 年版
40. 《法国新志》 [英]该勒低辑 [英]傅绍兰口译、潘松笔述, [英]秀耀春(F. Huberty James)、范熙庸同校 江南制造局 1898 年版
41. 《英法义比国志译略》 吴宗濂等译 1899 年无锡薛氏石印本

### (五) 交通与旅游地理学

42. 《西游地球闻见略传》(Tour of the World) [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译述 1819 年出版于马六甲

43. 《海道图说》(Chinese Sea Directory by Reed) [英]兵船部原书 [美]金约翰辑 [英]傅兰雅、[美]金楷理 王德均合译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4 年版
44. 《柬埔寨治以北探路记》 [法]晃西士加尼(Marie Joseph Francis Garnier)撰 1884 年泰华楼居士钞校刊刻
45. 《俄属游记》 [英]兰士德著 莫镇藩译 1894 年刊刻
46. 《黑蛮风土记》 [英]立温斯敦(David Livingstone)著 史锦镛译语 沈定年述文 陈以真校字 1897 年? 刊本

#### (六) 军事地理学

47. 《行军测绘》(A Practucal Course of Military Surveying, Tev. By Col. Robt. Pltey, London, 1869) [英]连提(Auguste F. Lendy)著 [英]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赵元益笔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3 年版
48. 《防海新论》(A Treatise on Coast Defence) [布]希理哈[Victor E. K. R. von Scheliha]著 [英]傅兰雅译、华蘅芳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4 年版
49. 《日本地理兵要》 [日]陆军省编 姚文栋编译 [北京]总理衙门印、同文馆 1884 年版
50. 《美国地理兵要》 顾厚昆编译 上海仁记书局 1889 年版
51. 《巴西地理兵要[附政治考]》 顾厚昆、郑之马揆编译 约 1889 年刊本
52. 《地势学》 [德]特屯和恩撰 杨锦堂译 黄丙隆、沈厚圻编次 [南京]江南陆军学堂 1899 年刻本

#### (七) 地图册与地图解说

53. 《万国舆图》 英国原图 陈兆桐译绘、李节斋重绘 1886 年刊本
54. 《万国全地图》 [日]渡边忠久编辑 东京协诚堂 1896 年版
55. 《支那疆域沿革略说》 [日]重野安绎 河田黑合著 日本富山房 1896 年版 清末舆地学会刊本
56. 《五洲图考》 龚柴、许彬辑译 上海徐家汇印书馆 1898 年版

从笔者统计到的上述涉及了七个方面的 52 种译著, 其中绝大部分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译者, 中国人为笔述者合作完成的, 这些地理学译著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家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种种新认识。传统中国地理学家对地理学的考述多集中于人文地理, 往往喜欢运用概括的语言, 对地理现象大多采用一般的知识描述, 没有较为严格的分析, 而 19 世纪传入的西方地理学译著, 则从地势、陆地、洲岛、山岭、峰峦、火山、地震等自然之理的论述, 到气候的燥湿、潮汐之涨退、波浪之大小、飓风的狂旋、泉源湖泊和海洋江河的成因的探讨。

中国传统地理学对人文地理的探讨范围多集中在域内, 没有整体的地球地表的概念, 对人文地理的考察, 其广度和深度也非常有限。19 世纪的中国“地理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

一面貌。从亚细亚洲、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亚墨利加洲、大洋群岛的土著居民及人口、自然景观、物产、农业、工业、商业，到各国的政府、法律、语言、文学、慈善事业、生活方式与国防等等，都有较为清晰的科学描述。“四海虽远，在一积块中尔”，而且这一“积块”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正在变得愈来愈小：“地球大矣，今判为东西两半球，其间辽阔数万里，极西之国，自古不通中土。波涛险恶，视为畏途。至今日近一日，广通舟楫，火轮龙尾，驶行迅捷。极远之地，二月可达。陆路则有火轮车，驱驰远道，瞬息百里。”[20]地理视野和知识范围有了根本性的拓展，从荷马、阿那克西曼德、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埃拉托色尼、托勒密到哥白尼、哥伦布、麦哲伦、库克、李文斯敦、洪堡等，大多西方地理学家及其学说已有所提及。

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主译的地理学著作中所引进的西方地理学知识范围涉及了地理学通论、地球与地文学、气象与气候学、区域地志、交通地理和军事地理等范围，因此在这些译著中出现了传统地理学中所没有的术语，而且这些术语得到了相对比较科学的界定。如“世界”(World)、淡水(Fresh water)、地壳(Earth crust)、地形(Land form)、方里(Squar mile)、高原(Plateau)、横谷(Cross-valley)、直谷(Longitudinal valley)、空气(Air)、贸易风、恒风(Trade-wind)、珊瑚岛(Coral island)、咸湖(Salt water lake)、“海湾”(Bay)、“子午线”(Meridians)、“自转”(Rotation)、冰川(Glacier)、“层累”(Stratigraphic sequence)等。1889年孙维新在回答“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一文中解说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地理学译著：“慕维廉之《地理全志》，印行颇久。后于光绪九年，复校正重印，其论大地诸国，详明简要。共分五洲，每洲首论其文质政。每国并详其风土、人情、物产。国名、地名，多采取《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二书，其书不略不详，大合文人之用。此前有玛吉士译之《万国地理备考》，与之相若，今版已毁。再有祿理哲著之《地球说略》一本。初印于咸丰六年，重印于光绪四年。其论各国形势、风土、民性、物产，与《地理全志》大致相同，惟辞意浅简，合于启蒙之用。另有美国甘弟德著之《地理问答》，刊印已久，后于光绪十二年重加修补。其书凡八十三回，有问有答，甚便课蒙之用。光绪八年，美国江德载辑《地理志略》一本，凡九十九章，先述情形，次设条答，亦为课蒙而设。外有慕维廉译之《大英国志》、裨治文译之《联邦志略》、阙斐迪译之《俄史辑译》等书，亦尝略及地理。”[21]该文中不仅提到了上述许多西方地理学译著，而且也已用上了“自转”、“世界”、“层累”等地理学的术语。这些地理学术语的出现不仅对近代中国地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有些新词还进入文化领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如“层累”。1922年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的观点，在中国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我们从清末著名的思想家郑观应撰写的《救时揭要》(1873年出版)和《易言》[1880年出版]两部著作中，也可见出思想家的思维空间随着地理学新知识的增多，有了很大的拓展。据乐正的统计，《救时揭要》出现国外地名15个，外国地名的使用频率英国9次，美国1次，法国4次，布鲁士2次，欧洲3次，泰西8次，日本4次；《易言》中出现国外地名多达60个，



外国地名使用率也大大增加,其中英国 30 次,美国 15 次,法国 26 次,德国 25 次,欧洲 16 次,泰西 55 次,日本 13 次;《救时揭要》平均每千字含国内地名 3.5 次,国外地名 2.3 次;《易言》则含国内地名 2.7 次,国外地名 4.7 次。可见《易言》中使用的外国地名竟比国内地名还要多,比七年前出版的《救时揭要》平均使用率恰好多了一倍,其中“泰西”一词的使用量比《救时揭要》多近 7 倍。这两本书使用的国外地名中,属于欧美和日本的地名分别占 78% 和 73.6%。[22]上述的统计可以看出,19 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地理学译著绘制的知识线,给中国政论家思考问题和评述时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意识。

19 世纪中国人的地理学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70 至 80 年代《格致汇编》中刊载的读者有关地理学的问题是“问地球五大洲之名,各有何国家”、“地球为何只有南北两极而无东西两极”、“西人云,地球之径为二万五千里,不知用何法测得”等等;而 1902 年 10 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招生考题中有“问亚细亚洲有向南入海中之半岛,在南者为阿拉伯、为印度、为后印度即缅甸、暹罗、安南及马来隅等地,在北者为冈札德加,试以欧罗巴洲地势比之,与亚洲各半岛相似者为何地?”“问英吉利、日本皆称地球雄国,而其国内均无长河大川,其故何也?”“问昔年俄罗斯据海参威,英吉利即欲据巨文岛,其后俄人借租旅顺口,英复借租威海卫,试明其地之关系。”“问俄人常欲修铁路入阿富汗与印度铁路接,又欲得波斯海湾为出海之口,英人均力阻之,试明其关系。”[23]通过对清末早期出版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上读者所提出的地理问题,与 20 世纪初京师大学堂所出的地理课程考题进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在几十年所做的地理学译述介绍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中国的“地理大发现”确实给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人重建了引发后来巨大思想变革的“地理台阶”。

### 三、十九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意义

19 世纪中国的“地理大发现”虽然没有象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一样,带来造船工业以及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引发了后来一系列欧洲的工业革命,但中国的“地理大发现”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是巨大和深远的。明末清初的地理学汉文西书没有得到大部分中国士大夫的回应,在 18 世纪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地理学研究的生命力正在渐渐走向衰竭。[24]而中国“地理大发现”所引进的一系列西方地理学的新知识、新概念、新术语和新方法,为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全面的世界面貌,传播了前所未有的地理信息,给中国人开拓了全球性的视野,认识了一条崭新的全球地理状况及其分布规律的知识线,给中国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

“中国”一词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四世纪,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一个文化概念。“中国”是由空间中心的“华夏”和周边地区的“夷狄”两部分组成的,周边“夷狄”只有通过吸收“华夏”文化才能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天朝中心思想和朝贡制度下的宗主国的意识,都是这种没有列国并立的主权国家概念的产物。18 世纪末英使来华被视为“英吉利贡使”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 世纪中

国“地理大发现”渐渐使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只是居于一隅，甚至只是东亚区域的一部分，由此粉碎了中国士大夫以天朝为中心、惟中国有文明的陈腐观念。如冯桂芬等已开始认识到两千年前哲人邹衍的“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的假说并非“荒唐之言”，这些新的地理学译著已让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远远地超过了清初最杰出的学者顾炎武，懂得了“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驹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25]出使欧洲的大臣薛福成在使欧日记中写道：邹衍的“大九州”之说，“司马子长谓其语闳大不经，桓宽、王充并讥其迂怪虚妄。余少时颇疑，六合虽大，何至若斯辽阔？邹子乃推之至于无垠，以耸人听闻耳。今则环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势方里，皆可核实测算。余始知邹子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邹子从而推算之，未可知也。”[26]一个全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世界，令这些有幸到欧美等地亲眼目睹盛况者感到激动和着迷。

康有为是在1885年开始接触外国史地知识的，始“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渐渐懂得了“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27]1894年的《桂学答问》中他给学生开列出的参考书中就有军事地理学方面的《行军测绘》、《防海新论》和《御风要术》等，认为这些书“皆有用之书也。”[28]18岁入京会试的梁启超在上海购得取材于西方地理学的《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29]“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而反对“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成了晚清知识界的共识。[30]一位名叫易鼎的学者是这样批判传统天朝自大观念的：“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风俗不善，无礼无义，乃曰夷狄。是故中国而类乎夷狄，则降而夷狄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斯义既昧，于己国之风俗，美者益夸大而张皇；劣者乃弥缝而掩盖。虽其极陋甚弊者，亦举国习以为然。沈锢缚于其内，莫能冲破其藩篱。一语及他国之风俗，较胜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诸口。恶者则援之以为谭柄，且过当其实。近者海禁宏开，万方辐辏，无知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各国之故技，夷狄他洲也。”[31]可以说，明清之际曾在一小部分士大夫中出现的“世界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人中已经渐渐蔚成了一种群体的共识。

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从“万国”的概念中生发出来的，有了民族国家的概念，才会有在万国中利用国际法重新争取新的平等的概念，爱国心亦由此基础而产生。地理空间概念的拓展与国家意识的形成，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与15世纪以来西方地理大发现对近代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相似，19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中国思想界处于极为活跃的状态。中国人从文化独尊的骄狂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经历了痛苦的失落，渐渐又重新在新的世界范围内恢复和建立起自信，而形成新的国际交往观念。“主权”概念的日渐成熟，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开始吸取西方的国际观念。[32]1861年冯桂芬将古代春秋战国的形式来比拟当时列强并立的世界，首次提出加强外交的建议，以后郑观

应、马建忠、王韬、陈虬等都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这种通过追溯上古来回应现时世界的挑战,在今天看来未免陈腐,但将19世纪的世界与春秋战国相比较,在当时实在是反映了一种崭新的国际意识,因为是放弃了原本一直固守的天朝中心的观念,以古史为鉴来重新思考中国所面对的新的世界时空。郑观应在《易言·公法》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果中国不放弃“内外之辨、夷夏之防”的“天下”意识,那就不可能享有国际公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也。”[33]只有把自己视为“万国之一”,才可能在变化着的世界里,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重新争取新的平等的概念。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称自己是在1902年八国联军之后才了解道:“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身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感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34]所谓“国”的自我认识,就是在19世纪末开始流行起来。一般中国人喜欢将自有的事物与名称,加上“国”的冠称。例如“国家”、“国民”、“国权”、“国力”、“国土”、“国地”、“国粹”、“国语”、“爱国心”等等。

确信各种不同空间的国家与民族的存在,也就意味着确信许多不同文明圈与知识体系的存在,因而也就拓展了求知的领域,唤起了进一步学习和探索西方文化的热情。可以说,19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为中国人向域外寻求新知识建立了“地理台阶”,正是走在这个“地理台阶”之上,中国人一步一步推进了对“西学”的理解,从兵船制造的技术科学,到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理论;从交涉公法的社会规范,到哲学文学的心理认知的层面,19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正是这样逐渐理解了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念。只有破除了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夷夏观,确立了新的世界空间观念,才可能在新的“地理台阶”上建立起新的世界文化观念和文化圈的意识。承认域外文明世界的存在,才能正视其他民族不仅在自然环境方面,而且在技术发明和社会规范方面,有和中国相等甚至高于中华文明的可能性。“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千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35]与大清天朝有着同样的自然地理空间,为什么不能有同样高、甚至更高的文明呢?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徐继畲在传教士传入的文献中找到了“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的美国民族英雄华盛顿,赞赏他“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帝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认为“米利坚合众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36]晚清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概念,并成为盛极一时的学说,尽管其中还存在着对文明价值高低的认可问题,但至少表明中国文化人已经普遍承认和接受了不同“文明圈”的存在。

历史学没有什么功利的价值,但它是一种思维的生态系统,改善着人们对文化与文明的理

解。对历史的理解往往反映着一个民族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无所谓“天朝”，无所谓“中心”，于是在晚清史书编纂上开始抛弃传统的“正统”观念。传统中国史书书法上都有所谓“正闰”之辨，所谓“正闰”，即正统与非正统。地理上没有“中心”，天朝中心的思想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没有“天朝”，史书编纂上就不存在所谓的“正统”。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中指出：“自儒者以笔削说《春秋》，谓降杞为子，贬荆为人，所以示书法，是谬悠之谭也。自史臣以内辞尊本国，谓北称索虏，南号岛夷，所以崇国体，是狭隘之见也。夫史家纪述，务从实录，无端取前古之人，他国之君，而易其名号，求之人情，奚当于理。”他在《日本国志》卷首《中东年表》中认为编写各国史书，“当依列国之制，各君其国，即各自纪年。”[37]中国历史学家开始抛弃传统的“天下”观念，而在史学上也建立起一种全球意识的历史认识，承认世界有多元文化圈的存在。中国有着一个善于以史为鉴的传统，在晚清逐渐从中国古代历史为鉴转变为以世界历史为鉴，于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后来一些世界上弱小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都成了中国的历史借鉴。事实上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作为楷模的英雄人物也逐渐从传统的汉武帝、朱元璋、关羽、花木兰演变为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贞德；“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正是从现代国家的角度出发，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只有“朝廷”，没有“国家”，把“朝廷”与“国家”分开的观念是他在《新史学》中反省旧史、开辟新史的一个重要凭借。

#### 注释：

- [1] 本文将 19 世纪作为一个单元，而没有将更长的时段——晚清或清末民初——作为考察的范围，是因为笔者认为 19 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所形成的启蒙运动和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观点而被知识界广泛的接受，都表明 19 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对“世界意识”的群体认识和“文明圈”的概念。
- [2] 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 1962 年，页 5。
- [3] 《庄子集释》，载《诸子集成》[三]，上海书店 1986 年，页 101。
- [4]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 1977 年，页 2344。
- [5] 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载《考古》1979 年第 5 期。
- [6]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 1977 年，页 1473。
-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页 246。
- [8] 台阶原是指矿场不同的水平分层，操作者在独立的不同的分层上进行采掘。笔者这里借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同一时代人们对地理的认识水准构成一种地理知识的认识台阶，同一时代的哲学的构造、政策的制订，往往都离不开这样的“地理台阶”。

- [9]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1977 年，页 237-238、246、263。
- [10] 范祎《中等地理教本序》，[英]汉勃森著《中等地理教本》，广智书局 1907 年。
- [11] 参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二分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 年，页 68、793。
- [12]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卷 2。
- [13] 姚莹《康·蝻(车字旁)纪行》卷 5，页 1。
- [14] 玛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 又译若瑟·马丁诺·马葵士, 1810—1867), 是久居澳门的马葵士(Marques)家族成员之一。曾就读于圣若瑟修院, 他的粤语和官话都十分娴熟, 中文造诣颇高, 毕业后在澳门政府当翻译官, 许多中葡来往的文件是由他翻译的。1847 年, 他应聘赴北京任法国驻华公使馆翻译, 晚年回到澳门潜心研究汉语, 在双语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他曾编刊有《音乐要素》和《中葡字典》, 但后者似乎未正式出版。所撰的二十万字的中文地理学书《外国地理备考》(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 在晚清地理学界影响深远。(参见谭志强《澳门与中国近代国际关系知识之引进》, 载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 澳门基金会 1994 年, 页 190; 刘羨冰著《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 澳门基金会 1994 年, 页 42-43。)
- [15] 引文出自魏源《海国图志》叙。
- [16] 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21;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 文海出版社, 页 1622-1623。
- [17] 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24; 同上, 页 1876-1877。
- [18] 林则徐《覆奏曾望颜条陈对关禁海事宜折》, 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 第 1 辑, 第 1 分册, 页 164。
- [19] 本表参据的资料采自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附录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 [20] 《六合丛谈二卷小引》, 载《六合丛谈》1858 年 2 卷 1 号。
- [21]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 已丑年, 上海书局 1897 年石印本。
- [22]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1860—19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页 179-180。
- [23] 朱有猷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页 940。
- [24] 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第一章; 邹振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与明清士人的“世界意识”》, 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 第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页 23-72。
- [25] 冯桂芬《采西学议》,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页 82。
- [26]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 岳麓书社 1985 年, 页 77。
- [27]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载《戊戌变法》[四], 神州国光社 1953 年, 页 112-116。

- [28] 参见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62。
- [29] 梁启超《三十自述》，载《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页49。
- [30] 魏源《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载《海国图志》卷76。
- [31] 易鼎《五洲风俗异同考》，载《湘学新报》1898年5月1日，第35册。
- [32] 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32。
- [33]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67、175-177。
- [34] 陈独秀《实庵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7。
- [35]、[36]徐继畲《瀛寰志略》卷9。
- [37]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